

李治安：沧桑五千年(中)

中国如何成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

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无疑是中华文明特色之一。

纵览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共时性”地存在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若依文明属性，可概分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长城以南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中原与江南等若干分野。早在汉武帝时代，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范围内业已形成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西楚、东楚、南楚等边缘经济区。而后，中

原、关陇、海岱、江南、塞外等地域都曾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近两千年来，它们又逐渐整合演化为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塞外大漠等三大地域子文明板块。这大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根基。

中新社记者：两千年来，黄河、长江和塞外三大子文明板块之间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李治安：由于长城内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长期并存互动，东汉以降，南北地域族群的互动发展，取代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夷夏东西博弈，上升为中华地域子文明相互关系的“主旋律”。

首次南北互动整

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隋唐曾实施“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中唐以后总体上向“南朝化”过渡。

元统一后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元朝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制、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由于北制因素过分强大，元朝总体上是北制占上风。

明前期曾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包括军户、匠籍在内的“配户当差”户役法，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廷杖”士大夫等，都能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明后

期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应是南、北制因素再整合的成果，堪称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

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依然是统一国家的条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新兴动力的渊藪。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的角色及能动功用，至为关键。大运河也生逢其时，沟通南北水系交通，适应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错位需要，充任了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带

动、辐射北方，进而推进全国社会经济整合发展的特有通道。

中新社记者：与上述地域子文明相关联的民族交融汇合，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李治安：回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时性”地呈现先秦、秦汉魏晋、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四次民族大融合期间几乎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族群纷争或交融，之后才是政治大一统及若干子文明的相应整合。

上述四次民族大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及领袖人物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是决定性因素，是文明发展的两条或有交织的基本线索。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二主线因素来支配、塑造的。与此相关联，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又需依赖于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撞与整合。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



秦始皇陵兵马俑。陈玉宇 摄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是游牧民族政权北魏迁都到中原地区后在此间开凿的皇家洞窟。周沁军 摄